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 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王 浩

【摘 要】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关键词】美国外交;战略竞争;国内政治;联盟重组;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出处】《当代亚太》(京),2021.4.4~27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专项“充分利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对中美贸易战研究”(批准号:19VDL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使两国学界对于大国战略竞争这一学术命题的关注度在近年来持续攀升,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热点。^①这里所说的大国战略竞争,指的是在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展开的最高级别的国家间竞争。^②这种竞争是全球性、全方位和长期性的,它不仅是利益与力量之争,还是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之争;它不仅停留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硬实力领域,还存在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软实

力层面;它不仅涉及竞争双方的互动和博弈,而且关系到国际格局的走向、国际秩序的调整甚至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上述重要影响,结合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美步入战略竞争时代的新背景,从历史与理论维度对大国战略竞争进行思考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

回顾历史,自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大国并进行海外扩张以来,美国便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参与者,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全球霸权

以后,更成为这种竞争的主角甚至主导者。其中,美国与苏联之间的战略竞争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政治,而中美间战略竞争态势的不断强化则将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因此,在“大国战略竞争”这一学术命题的总体框架下,将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逻辑作为具体案例加以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大国战略竞争的历史与理论,而且可以为全面审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和趋势提供学理支撑。

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是其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核心组成部分。大战略通常指一国为实现安全、权力、财富和价值观等国家利益而对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③按照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等战略学家的传统观点,美国大战略的本质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与统筹。^④由于大国战略竞争在外交实践中对美国的利益和地位构成了根本挑战,因此,大国竞争战略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成败。在成为全球性大国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尽管维护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但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却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差异性和动态调整性,经历了一个分阶段的演化过程。

首先是美国对欧洲大国的战略竞争阶段。在此阶段,欧洲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中心,世界政治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扩张的狂潮中。^⑤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大国之间存在有关世界霸权和海外殖民地争夺的激烈较量,而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正在走向海外扩张的美国则与整个欧洲存在经济利益和殖民地瓜分的战略竞争。以现实主义(realism)为原则的经济保护主义、大规模扩建海军与势力范围扩张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核心,这一战略选择一直持续到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和美国正式参与并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⑥

其次是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竞争阶段。二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形成和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国际机制

与相应国际秩序的构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政治、军事阵营间的冷战成为世界政治的主题。与此前以地缘政治争夺为焦点的大国战略竞争不同,美苏间的战略竞争是地缘政治较量与意识形态博弈的结合。此外,核武器的“相互确保摧毁”效应推动国际关系进入了“大国无战争”时代。在上述背景下,以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为原则的遏制(containment)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核心。^⑦

最后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阶段。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崛起与历史上美苏等大国崛起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发展战略全然不同。伴随自身不断主动融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体系,中国成功推进了“体系内崛起”的进程,即通过和平、合作与建设性方式与既有霸权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共处甚至达到相互依赖。^⑧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构建起一种有别于此前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既有关系形态,形成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体系内两强”关系。^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同年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并推出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标志,在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加速、战略竞争色彩日渐增强,以及相互依赖、国际制度、伙伴关系和全球治理等新要素成为世界政治主题的背景下,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ic institutionalism)框架下的利益博弈成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核心。^⑩

以上简要梳理清晰地表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不仅呈现一种持续演化的特征,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大国关系以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深化和完善对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逻辑的理解,无论是在学术创新层面、还是在政策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致力于在总结和反思已有的三大主要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的基础上,从体系中心主义视角延伸到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领域,将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与国内政治(domestic politics)结合起

来,构建一个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逻辑的分析框架,以更好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审视和诠释。

二、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及其不足

在探索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变逻辑的过程中,国内外学者的理论创新尝试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为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勾勒出一幅宏观的理论进化图景。从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现实制度主义,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研究范式的演进本质上反映出国际体系、竞争对手和美国自身实力三方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差异。

首先是国际体系的差异。按照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观点,以二战的结束为转折点,国际体系分别经历了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文化到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的转型。^⑩在上述体系转型的背景下,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进行了相应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体系环境。其次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差异。从欧洲列强到苏联再到中国,美国面临的战略竞争对手无论在政治制度、对外战略还是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大国竞争战略。最后是美国自身力量(尤其是与他国相对力量对比)的差异。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分别应对来自欧洲、苏联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时,美国的综合国力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再由盛转衰的过程。因此,美国拥有的战略资源和可资利用的战略手段必然不同,这就导致其大国竞争战略的选择随国力消长而不断演变。

(一)现实主义范式及其不足

现实主义是理解二战前美国大国竞争战略逻辑的主要切入点。^⑪这一国际关系的传统研究范式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决定了国家对外战略的走向,只有系统考察体系层面的变量尤其是国际权力结构,才能对国家的战略行为做出恰当分析。^⑫在此阶段,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处于世界权力

的中心,以英国、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在围绕世界霸权和海外扩张的竞争中形成了以权力政治为基本准则的大国关系形态。因而,尽管美国自立国时起便有着“例外论”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由于当时自身的实力地位与国际影响力难以与老牌欧洲大国相抗衡,故而采取避其锋芒的现实主义对欧竞争战略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⑬例如,在世界主要大国的海外扩张浪潮中,美国并未挑战欧洲大国的既得利益和地区秩序,只是尝试在拉美和东亚等边缘地带扩展市场,因此没有遭到欧洲列强的大规模干涉和挤压。^⑭又如,按照现实主义的主流观点,对于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而言,这一时期更具紧迫性和战略性的发展重点是建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尤其是海军力量,以在未来围绕海外扩张的大国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⑮

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准确把握了二战前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主要内容与核心特征,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颠倒,无法充分阐释这一阶段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关键案例及其背后的根本动因。首先,现实主义将美国对欧竞争战略的前提假定为美国是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地带的弱势一方,因而其战略重点是在避免与欧洲主要大国产生尖锐冲突的同时,积极壮大自身实力并进行外围扩张。这一理论假设及其推论都有待商榷。一方面,美国早在1894年即超过英国成为当时世界工业总产值最高的国家,到一战结束时更是拥有按照自身理念和原则改造国际体系的实力和机遇,并且以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为代表的国内政治精英也的确开始致力于让美国通过国际联盟这样的制度化安排获得世界领导权。^⑯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在此期间已经走进国际权力结构的中心,而非处于边缘地带。因此,现实主义的前述理论假定并不成立,现实主义范式也无法有效解释美国为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推行现实主义的对欧竞争战略。同时,历史也已表明,威尔逊时期美国外交的自由主义探索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源并非来自国际体系而是国内政治。

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也未能充分解释为何美国在此期间大力推行对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不惜通过主动挑起大规模关税战同欧洲大国展开激烈竞争,而非一味避其锋芒。^⑧总之,美国的现实主义对欧竞争战略更多地是以利益为导向而非受制于欧洲大国,更多地体现出战略进取而非战略妥协的特征。

(二)自由主义范式及其不足

二战后,自由主义成为观察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主流范式。随着世界政治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美苏两极格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意义上的形成,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大量出现并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单一的现实主义视角已无法适应国际体系的上述变化。^⑨自由主义视角认为,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自由国际主义——将美国自身权力的运用与多边主义、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联合所谓“自由世界”以遏制苏联及其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成为美国同苏联竞争的战略选择。^⑩按照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等的研究,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战略包含四个核心特征:一是安全问题的首要性;二是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三是对于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和同盟体系的强调;四是海外干涉与意识形态竞争。^⑪

自由主义范式对于二战后美国对苏竞争战略的新特点,尤其是其与此前对欧竞争战略的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这一范式创新对于理解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战略以及世界政治和国际体系出现的新变化都大有裨益。然而,与现实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类似,同样以体系层次变量为研究出发点的自由主义并未提出一个关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逻辑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例如,在战略的宏观变迁层面,无论是自由主义强调的二战后国际体系以制度为导向的变化,还是美国自身在崛起过程中运用自由主义原则改造外部世界能力的提升,都无法解释为何二战后的美国迅速改变了保护主义

政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并构建起以全球自由贸易网络为基石的经济霸权,进而打造与苏联进行战略竞争的根本优势。概言之,自由主义是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又如,在战略的微观调适层面,自由主义范式也无法回答在体系结构和制度安排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为何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盛转衰,无论是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卷土重来,还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攻守易势,都表明这一时期推动美国对外战略调适的根本动因存在于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以外。^⑫

(三)现实制度主义范式及其不足

冷战后,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权势的相对衰落,中美战略竞争趋势的强化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两国关系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因为无论是美欧战略竞争还是美苏战略竞争,都曾给国际关系带来体系层面的巨大冲击。^⑬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实践表明,这种战略竞争既非冷战对峙的关系,也非战争敌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状态下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形态:一方面,中美是一对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间的战略合作无论对双边关系、地区稳定还是全球治理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又存在广泛的战略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并非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比拼,而是围绕对于国际制度的塑造、改革和领导等所展开的竞争。^⑭因此,现实制度主义在折中主义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整合,提出了理解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新范式。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的新变局出发,现实制度主义提出,围绕国际制度的创建、维系和改革所开展的竞争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对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特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阐述。然而,这一范式

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生成的逻辑探索方面只是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在具体案例和政策实践的分析领域存在模糊化的缺陷。例如,尽管从奥巴马政府执政时起,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整体上一一直呈现现实制度主义的特征,但在政策实践中,“现实”与“制度”依然是有着明确分野的两个战略重点而非统一概念。例如,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和拜登政府将制度性议题(包括规则、价值观及亚太地区秩序领导权等)视为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而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却在对华战略竞争方面更多彰显了“现实”的一面而非“制度”的一面——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自身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排斥,还是在对华战略上围绕传统的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大做文章,都表明我们对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实践逻辑的分析,需要在现实制度主义的框架下加以进一步细化,这就同样需要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对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从历史与理论多个维度为国际关系学界深入理解不同阶段美国相应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然而,由于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体系层次的理论创新,忽视了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底层逻辑,因此存在逻辑连贯性方面的不足,并且由于其无法充分阐释历史上及当下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案例,因而还存在经验解释力方面的欠缺。基于此,本文致力于超越体系层次,通过引入美国国内政治变量,将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进行融合与统筹,构建一个分析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逻辑的内外互动框架,从而在理顺其线索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有效地阐释历史与现实。

三、国内政治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一个内外互动的解释框架

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与一体化程度与日俱增,并开始不断挑战传统的关于民族国家统一性的

理论假设。^⑤在美国,鉴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以区域、产业和阶层等为代表的社会要素所具有的多元化特性,无论是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还是国际商品、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及更新,都经常导致一种“非均衡”的国内影响,从而使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在外交政策领域产生相近或相冲突的利益诉求。^⑥例如,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美国国内某些区域、产业和阶层可能因受惠于经济全球化而迅速崛起,另一些则可能因激烈的国际竞争而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美国五大湖区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带”在冷战后所遭遇的全球化冲击,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又如,大国战略竞争,尤其例如美苏冷战,引发的政府军费开支的迅速上升,会在美国国内产生“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效应,即有利于军工产业或分布有这些产业的区域的发展,却不利于其他区域,因为后者交付给联邦政府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被转移支付给了前者。^⑦总之,国内政治/社会利益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差异与失衡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围绕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军费开支、贸易政策、多边合作和海外干预等)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博弈的根源。

回顾历史,尽管上述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美国,但由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各类国内政治/社会行为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在其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比其他国家更为显著的作用,因而这一点在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核心的大国竞争战略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大国战略竞争在不同时期都会带来国际体系层面的重大影响,因而其走向不仅直接涉及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和军费开支政策(这与国内行为体最为关切的经济利益诉求密切相关),而且会通过其对国际体系和战略环境的宏观影响,间接地作用于国内行为体包括文化—价值观认同等在内的各项对外战略偏好。

笔者认为,正是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环境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及政治制度的共振,引发了其国内多元化的政治/社会行为体的差异化

外交利益诉求,进而推动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国内政治联盟间的激烈博弈,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制度化中介,形成了特定时期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随着国际体系环境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发展演变,这一共振效应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为国内主要政治联盟间的分化与重组,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演化方向。这一分析框架挑战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假设,尤其是将研究重点从国际体系层次转移到了国内政治/社会层次。通过回顾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演化历史,该框架试图表明,美国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大国竞争战略都是国内政治/社会利益博弈的产物。在实践中,这种博弈背后的驱动力存在于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第一,美国政治植根于国内社会,因而社会力量的偏好从根本上决定了民选政治精英在对外战略方面的政策立场。例如,当我们分析美国总统的重要外交决策行为时,通常将其身份设定为负责美国对外事务的最高领导人或战略家,却忽视了其另一重或许更为重要的身份——美国国内特定政党和政治联盟的领袖。因此,美国总统在进行外交决策时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受到国际政治因素和国内社会利益的双重影响,并且后者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③国内社会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美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结构性现象。自立国时起,由于美国始终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因此,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内的政治精英从自身利益(包括赢得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利益的诉求,这就使得特定的社会利益对政治人物的行为起到了约束甚至是塑造的作用。^④例如,早在美国独立之初,分别代表东北部和南方不同社会利益的政治精英便在国会围绕如何同前宗主国英国发展外交关系展开了激烈斗争——一方面,东北部的工商业、金融集团及其利益代表联邦党人(Federalists)主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获取经济

利益和相应政治好处,并且该地区进口的货物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故而主张保持英美合作;另一方面,代表南方农业利益的民主共和党人(Democratic Republicans)则从自身角度出发,反对英国商品大量涌入美国,主张对英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迫使其在贸易问题上让步以保护南方落后的产业。^⑤正是以上两大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才衍生出美国外交思想中的“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与“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ism)两种传统。因此,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产生的政治合作或斗争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国内社会利益趋同或相冲突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传导到国内政治层面,便形成了府会层面多元化的对外政策立场,从而为针对美国外交尤其是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博弈提供了舞台。不难看出,以上逻辑建立在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假设之上。依据该假设,政治人物可以被理解为在国内政治这一“市场”中寻求选票的各类“企业家”,他们在外交上的立场取决于各自代表的那些以不同区域、产业和阶层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的偏好。如果政客采取违背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利益的立场,必然会在选举中遭受惩罚,而这正是任何一个“理性人”都极力避免的结果。

第二,美国政治的制度设计及其游戏规则使得政治上多数或主导性联盟的构建成为必要,并且只有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且相对稳定的政治联盟,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才有可能较为持续有效地推行下去。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社会力量为了使国家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必然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政治联盟,从而实现主导政策议程的目标。^⑥从这个意义上讲,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而形成的国内政治联盟可以被理解为以共同对外战略利益为纽带,以国内不同区域、产业和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例如,美国之所以能在二战后初期构建起国内的“冷战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地推行一种以遏制政策为核心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国内出现了一

个能够从该战略中获取巨大利益的、由东北部工商业力量和南方种植园经济—军工利益复合体组成的政治联盟,并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按照美国学者彼得·特鲁波维兹(Peter Trubowitz)的研究,由于美国国内存在三大政治—社会力量中心,即东北部、南方和西部,因此,只要三者中有两者能够结成稳定的对外战略联盟,便可以在政治上获得多数地位,从而使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成为其意志的体现。^③

第三,由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关键动力来源于国内政治联盟的分化重组,而后者又植根于不同的社会力量随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外交利益诉求,因此,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和显著的周期性特征。自19世纪末开始海外扩张进程以来,美国国内政治联盟格局经历过三次主要的分化重组,每一次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方向。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形成了共和党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主导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国内政治结构,结果是该阶段美国的现实主义对欧竞争战略是这一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其次,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形成了跨越民主、共和两党的“新政联合体”,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主导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国内政治结构,这一时期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同样是上述主导性国内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的集中反映。最后,冷战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国内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及其各自政治联盟势均力敌且高度极化的政治结构,因而,其现实制度主义的对华竞争战略(2010年至今)丧失了此前两个历史阶段大国竞争战略的连贯性和统合性。尽管对华战略竞争是美国国内两大政治联盟的对外战略共识,但如何界定这种竞争、如何确立竞争的优先事项和战略重点、如何对不同的竞争性议题进行合理排序并投入相应战略资源,在美国国内存在分别以“现实”——如共和党强调的经济、安全议题,以及“制度”——如民主党强

调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议题,为出发点和侧重点的鲜明的党派差异。由此,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走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总之,对于国内政治联盟格局变迁的探究,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逻辑,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综上所述,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其国内多元化政治/社会利益博弈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和国内经济要素共同构成了塑造不同政治/社会行为体外交利益诉求的结构性力量,而这些行为体为使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最大限度地符合自身利益,总是倾向于构建基于共同利益并能在国内政治制度框架下占据多数或优势地位的政治联盟,从而最终决定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走向。此外,由美国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和多元化所决定,随着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变,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行为体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往往会形成差异化的大国竞争战略偏好,进而引发政治联盟的分化与重组。这一点构成了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关键动力。由是观之,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底层逻辑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内外互动机理上的政治学逻辑。

四、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1945–1989)

当二战结束的时候,国际体系出现的两极结构对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最重要影响在于,它与国内寻求全球性扩张并自罗斯福新政时起逐步形成并最终跃升至政治优势地位的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形成了共振,通过参与塑造这一新的主导性联盟的外交利益,使自由国际主义的对苏竞争战略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了上风。

二战期间,伴随着战时军事开支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化的突飞猛进,美国国内政治联盟经历了一轮深刻重组。在此前的数十年中,东北部和南方围绕贸易政策和军费开支等问题

一直存在尖锐矛盾,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东北部作为美国工业和经济的中心,随之逐渐转型为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受益者。例如,一战对欧洲经济的重创使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金融集团、银行家及先进工业企业得以趁势大规模对外输出资本和进行海外投资,从而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③结果是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同时,东北部日益稳固了其作为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经济结构变化所引发的对外战略利益变化,使美国东北部与一直以来就倾向于自由贸易的南方达成了战略共识,这一点成为东北部—南方联盟得以稳固构建的首要原因。^④

此外,在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看来,为确保实现自身不断扩展的海外经贸和投资利益,美国就必须通过增加军费开支、加深盟友协调以及开展多边国际合作等方式,确保海外市场免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的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还需要通过发挥国际制度和自身价值观的影响力,增强全球霸权的制度及合法性基础,有效应对来自苏联的战略竞争。就南方而言,对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的支持除了基于贸易利益外,还在于这一区域在二战期间逐步转型为美国新兴的“兵工厂”。在此期间,随着不断扩大对英、法、苏等国的军事援助,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为罗斯福所称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⑤在这一背景下,巨额军事订单和扩建军事基地的需要使发展军事工业成为南方的一项重要战略,加之美国拥有的强大工业实力,南方的军工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迅速崛起。^⑥基于此,南方已不再是军事开支“转移支付”效应的受害者,而成为最大的获益方。在变化了的利益诉求的驱使下,南方也相应地转而支持美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海外扩张。因此,随着冷战的开始,与东北部一样,南方同样成了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和遏制政策的积极拥护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联盟重组深刻影响了

冷战期间美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与大国竞争战略的演化。在这轮由大萧条所加速推动的重组中,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从美国南方迅速扩展到东北部,改变了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模式,在美国的核心地带形成了“两党共治”的格局。^⑦在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开始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两党围绕美国的对苏竞争形成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共识,即所谓的“冷战共识”,这一逻辑成为理解冷战期间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国内基础甚至先决条件。在实践中,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的四根支柱——持续增长的军费开支与军事力量、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与国际化的金融政策、不断扩大的海外承诺与对外干涉,以及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无一例外都是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尤其是经济诉求的反映。在美国全球利益扩展和霸权地位稳固的过程中,国内的东北部工商业和金融集团从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中赚得盆满钵满,而南方种植园经济和军工产业则通过贸易扩张和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同样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由此,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与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利益关切实现了一种高度契合的内外联动,从而推动了这一战略的持续、有效运转。

当然,自由国际主义的对苏竞争战略在美国国内也存在一批反对者,他们是西部的孤立主义势力。^⑧一方面,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西部的经济部门仍然是农业和原材料加工业,该区域仅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人口就超过三分之一,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相应地远低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⑨因此,西部依然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担心市场的开放会使越来越多的外部农产品涌入美国。另一方面,在西部社会的认知中,美苏冷战是非常遥远的存在,尤其是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在欧洲,这就使得西部对于冷战持明显的消极态度。^⑩加之西部地区是大萧条的重灾区,因而担心美国军费开支的迅速增加会牺牲政府对于国内资源的投

入,并带来不利于自身的转移支付效应。^⑩

总之,建立在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共同对外战略利益基础上的跨党派“冷战共识”,是美国以自由国际主义为特征的对苏竞争战略之所以生成和持续推进的首要前提,这一变化了的国内政治结构也成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进的逻辑依托。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并未出现根本松动,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演变,尤其是去工业化进程的开启,缓慢地催生出了新一轮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趋势,为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在冷战后的瓦解埋下了伏笔。正因如此,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连同“冷战共识”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衰落的苗头。一方面,东北部尤其是五大湖区“铁锈带”的去工业化进程逐步终结了其作为美国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地位,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使这一地区从自由贸易的提倡者转变为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进而主张美国进行对外战略收缩、控制军费开支并以尽可能低成本的方式同苏联进行大国战略竞争。^⑪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南方和中西部地区则形成了全然相反的利益诉求,它们主张通过扩展自由贸易体系增强美国经济的活力,同时鼓吹维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不断扩展的海外利益。此外,南方和中西部社会力量还认为,当时的美国之所以在与苏联战略竞争的过程中处于被动,根源在于缺乏强大的国际领导力,而重振美国霸权要求摆脱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束缚,加大对苏联的威慑。概言之,在冷战的后半期,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与美国国内的“冷战共识”虽然仍能在实践中大体维持,但潜藏在共识表面下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分歧已逐步显现,并在冷战后推动美国国内政治联盟经历了新一轮深刻的重组,由此带来美国大国竞争战略逻辑的改变。

五、政治联盟均势、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与美国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2010年至今)

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猛推进,美国的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新的深刻调整与变

化,成为新一轮国内政治联盟分化与重组的催化剂。事实上,与前文提到的联盟重组逻辑相关,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的历史周期理论,美国国内政治每40~50年就会经历一个变化周期,21世纪早期应该有一次政治重组发生。^⑫通过对美国总统及国会选举的观察,笔者发现,近年来美国国内有两大主要的联盟重组态势正在重塑着美国政治,并对其大国竞争战略的走向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

(一)联盟重组、对等极化格局下的“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之争

美国本轮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第一个趋势是,2008年以来,位于西南部的落基山区——包括亚利桑那、内华达和新墨西哥等州在内——正在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市化因素的推动下呈现日益显著的自由化倾向,成为民主党新的政治根据地。例如,在2018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便从共和党手中夺得了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两个参议院席位;而在州长选举中,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同样败于民主党人。^⑬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更是成为数十年来第一位拿下亚利桑那州选举人票的民主党候选人。概言之,美国西南部的这一重组态势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政治联盟的演化趋势,即在日趋保守化、本土主义化的传统支持者白人蓝领阶层,与日趋激进和全球化的白领、年轻人与外来移民之间,民主党逐渐将其政治重心决定性地向后者倾斜,进而使该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具有愈益浓厚的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色彩。就这两大选民群体的外交利益诉求而言,一方面,冷战后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与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持续发展使白人蓝领阶层——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的“铁锈带”——成为本土主义者,他们主张联邦政府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应对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非全球治理;希望扭转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创造更多制造业就业岗位,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然而另一方面,东西海岸与西南部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及白领阶层这一民主党更为倚重的群体,则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更加认同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对外战略取向。^⑤基于此,尽管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平衡与统筹上述两大选民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冲突的外交利益诉求,但在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背景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变得困难重重。最终,奥巴马与民主党精英基于政治利益的理性计算,开始将外交政策更多地建立在自由主义与全球主义理念的基础上(见表1)。因此,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将国际秩序领导权与价值观等国家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致力于通过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维护上述利益,进而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稳固。

美国本轮国内政治联盟重组的第二个主要趋势,是与第一个趋势紧密相关并在2016年大选中得到集中反映的五大湖区“铁锈带”的由“蓝”变“红”。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党传统的东北部政治联盟出现了重大分裂。一直以来,这一联盟主要是由新英格兰、中大西洋与五大湖区“铁锈带”三部分构成,但以白人蓝领群体为主体、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铁锈带”各州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在反全球化的利益诉求驱使下几乎全部倒向共和党并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⑥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一政治联盟的

利益诉求已成为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制定的首要甚至决定性变量,国内政治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界定作用因此愈发显著。具体而言,在外交政策领域,以白人蓝领群体为核心的政治联盟的主要利益诉求在于,改变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冲击,包括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制造业持续外流、制造业相关就业岗位减少以及收入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等,希望美国减少不必要的海外干预、降低对外战略成本、摆脱来自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盟友体系的约束,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为优先考虑。基于此,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始终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抓手,致力于扭转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实践,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同时力图扩大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与盟友分摊防务开支,以及通过退出多边性国际组织摆脱来自盟友体系以及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约束。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单边主义取向也是共和党传统外交理念的体现,并且其强调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在安全问题上采取更为积极和强硬的态度,同时将扩大美国的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等作为施政重点的做法,也反映出共和党主流政治精英及其相应政治/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偏好(见表2)。^⑦总的来看,与民

表1 “奥巴马—拜登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奥巴马—拜登联盟”的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东西海岸少数民族裔与外来移民	自由主义、全球主义	战略收缩、削减军费、低成本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东西海岸及西南部落基山区年轻人与白领	自由主义、全球主义	依靠自由主义、多边主义与国际制度维持美国领导地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2 “特朗普联盟”的主要构成、外交诉求及其政策影响

“特朗普联盟”的主要构成	外交诉求	政策影响
“铁锈地带”白人蓝领阶层	反全球化、再工业化	经济民族主义、美国优先、战略收缩、减少海外干预
大企业与中西部农业集团	全球主义、保守主义	扩大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
南方保守派与军工产业	保守主义、单边主义	摆脱国际制度约束、增加军费

资料来源:同表1。

主党人相反,特朗普政府将经济与安全议题置于价值观与国际秩序议题之前,认为现实主义式的对外政策是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利益进而全球霸权的最佳手段。

以上分析表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大国竞争战略)的走向,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时期,建立在全然不同的国内政治基础和联盟利益偏好之上,呈现显著的党派分野特征。这表明,美国最新一轮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趋势不仅使政党政治的极化程度进一步加剧,而且两党各自代表的政治联盟之间势均力敌的态势也更为明显,进而塑造出“对等极化”的国内政治格局。就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而言,“奥巴马—拜登联盟”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取向与“特朗普联盟”的保守主义—本土主义取向之间的激烈角力,将会不可避免地加深两党之间的观念鸿沟,进而加大美国对外战略(包括大国竞争战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摇摆性。

(二)国内政治与美国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日益显著、两党对等极化逐步加深,以及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与保守主义—本土主义两种对外战略观念剧烈碰撞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与此前大国竞争战略的两个主要案例类似,当前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同样是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国际体系因素的影响而言,美国国内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后,已经形成了以竞争为导向并且跨越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华战略共识,其标志是2017年12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④这一战略共识逐步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美实力对比与各自战略选择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崛起、特别是与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减,

使两国在国际体系层面出现了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描述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难以摆脱的“修昔底德陷阱”;^⑤另一方面,从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尤其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始,在美国致力于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中国对外战略却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型。^⑥可以说,实力对比与战略选择同时变化引发的共振加剧了美国两党精英层的焦虑。^⑦

然而,在国际体系因素推动美国国内近年来形成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背景下,民主、共和两党却未能就对华竞争战略的具体选择达成如“冷战共识”那样的一致。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前文提及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差异,尤其是体系环境和双边关系性质的不同,但更具解释力的原因在于,在对等极化的国内政治结构下,两党各自代表的政治联盟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出现了共和党“特朗普联盟”将“现实性议题”如经济和安全等置于优先地位,而民主党“奥巴马—拜登联盟”更加重视“制度性议题”的党派分野。基于这一国内政治逻辑,“现实制度主义”的提法并非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一种统合性与杂糅性描述,而是其随国内政治的党派更迭而在战略实践中分别将“现实”与“制度”两个维度加以突显的体现。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面对自身战略优势的相对下降、大国战略竞争更趋复杂的外部挑战以及新的国内政治联盟的重组趋势,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从赢得竞选连任、强化政治基础及推进党派政治利益出发,在如何进行大国战略竞争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等重要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在“奥巴马—拜登政治联盟”看来,金融危机后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美国要想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取得同中国竞争的主动权,就必须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内建设,推进全球战略适度收缩,同时运用自由主义、多边主义、盟友体系与国际制度的力量,确保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⑧例如,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到拜登的全球战略构想,强化在制度、规则和价值观

层面对中国的约束和打压,同时充分协调盟友和伙伴关系以防止中国冲击既有国际和地区秩序是其对华竞争战略的重点。^⑤然而另一方面,在“特朗普联盟”看来,“让美国再次伟大”则意味着要改变经济全球化对美国相关产业带来的不利冲击,摆脱国际制度、多边主义和盟友体系的约束,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以美国的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安全利益为优先考虑。例如,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以单边主义方式发动的大规模对华贸易战成为其对华竞争战略的核心。基于此,政治联盟重组背景下两党精英基于各自代表的国内社会利益的理性计算而形成的国家利益观及对外政策理念,是理解美国对华竞争战略逻辑的关键。

总之,正是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联盟存在各自利益偏好基础上的对外战略观念分歧,美国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在实践中才表现出分别强调“现实”和“制度”的摇摆性特征,进而在两党对华战略共识的宏观背景下,先后经历了从奥巴马政府时期以“制度—价值观”竞争为重点,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以“经济—安全”竞争为重点的演变。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整体基调重新回归到强调重振美国的价值观及其全球领导地位上来,并进一步突显美国对于盟友体系、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倚重,同时,对华竞争战略方向上的制度竞争和价值观竞争再一次显露端倪。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特别是对等极化背景下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对于其对华竞争战略后续调整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

通过上文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变化,尤其是政治联盟分化重组的逻辑出发对二战后其对苏、对华竞争战略的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之所以不会走向美苏冷战时期的形态,除了国际体系和双边关系性质等的根本差异外,美国国内政治在两个历史时期存在的显著区别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此外,从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内外互动逻辑出发可以发

现,中美关系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与美苏关系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前者深度影响甚至塑造了美国国内多元化政治/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和诉求(尤其在经贸领域),这就使得国内政治在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中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避免双边关系在短期内迅速滑向隔绝、对立和冷战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新冷战”来形容中美战略竞争有待商榷。

六、结论

大国战略竞争是国际关系的恒久主题。通过梳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采取的大国竞争战略及其变迁逻辑,笔者系统总结并批判性地回顾了国内外学界已有的三种主流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制度主义,表明这些既有研究由于普遍聚焦于体系层次的理论创新,忽视了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的底层逻辑,因而存在逻辑连贯性方面的不足和经验解释力方面的欠缺。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本文尝试超越体系层次的分析,通过引入美国国内政治—社会变量,将地缘政治与国内政治进行融合与统筹,构建起一个基于内外互动的关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化逻辑的分析框架,在理顺其线索的基础上,更加深入有效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阐释。

从由内而外以及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进行观察,笔者认为,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演化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一以贯之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来自国际体系尤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最终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走向。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根本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

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

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在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及其与美苏战略竞争之间的根本差异时,除了要考虑国内外学界已经探讨得较为充分的体系环境和双边关系的性质外,美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变化,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发展对于这些政治力量利益诉求的影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并且这一点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日趋极化、社会更加分裂的背景下,更值得深入挖掘和分析。因此,我们对于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进行更多实证研究。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①近年来,中美两国学界产生的代表性理论研究成果,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大国权力竞争:行为原理与互动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页;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与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0期,第21~27页;Aaron L.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 Vol. 60, No. 3, 2018, pp. 7-64;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No. 2, 2018, pp. 60-70。

②竞争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形态之一,其性质介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竞争型关系的核心特征既包括合作型关系中的基本元素(如政治对话、经济往来与军事交流),也包括敌对型关系中的基本元素(如利益与影响力的争夺),因而是一种最为复杂、也最难应对的双边关系形态。参见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第100~101页。

③Robert Art, *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Praeger, 1954, p.31; 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43; Georg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Barry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 Robert Art, "A Defensible Defense: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ler eds, *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7, p. 79; Thomas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⑤参见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章。

⑥Benjamin Franklin Cooling, *Gray Steel and Blue Water Navy: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merica's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1881-1917*, Hamden: Archon Books, 1979, pp. 113-160。

⑦按照美国著名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的研究,自由国际主义是指二战后国际秩序所体现出的一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等级秩序,其中,美国在提供规则(rule)和稳定(stability)方面发挥着领导作用,并且这一领导作用是由美国无与伦比的权力(power)及其自由主义治理原则(liberal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两方面构成的。参见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

⑧参见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5期,第21~37页。

⑨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7~20页。

⑩现实制度主义是大国战略竞争新背景下对中美关系的理论思考,是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基础上理解美国大国竞争战略演变的最新探索。参见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⑪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6,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ter 4。

⑫Thomas G. Peterson, J. Garry Clifford and Kenneth J. Hag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3rd edition, Boston:

D. C. Heath & Company, 1988, pp. 153–213.

⑬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chapter 4.

⑭“美国例外论”包括四个方面的核心内涵:美国优越论、美国榜样论、美国使命论和美国神佑论,即认为美国占据着全球道德的制高点,有责任去改变世界,并且其事业将永久得到上帝的保佑。参见 Stephen M. Walt, "The Myth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0,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the-myth-of-american-exceptionalism/>。

⑮ Jules Davids,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Mexico, 1877–1920*,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Lester D. Langley,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Mediterranean: United States–European Rivalry in the Gulf–Caribbean, 1776–1904*,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6; Joseph Smith, *Illusions of Conflicts: Anglo– American Diplomacy toward Latin America, 1865–1896*,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⑯ Walter R. Herrick, Jr., *The American Naval Revolu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54–68.

⑰祖波克:《美国史纲(1877–191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2 年版,第 344 页;黄安年:《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 ~ 14 页。

⑱关于这一时期美欧关税战的具体分析,参见 Tom E. Terrill, *The Tariff, Politic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874–1901*,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3。

⑲二战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催生出了自由制度主义这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参见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77;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order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⑳ Melvy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ntroduction.

㉑ Charles A. Kupchan and Peter L. Trubowitz, "Dead Center: 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2, Fall, 2007, pp. 7–44.

㉒ Ole Holsti and James Rosenau, *American Leadership in World Affairs: Vietnam and the Breakdown of Consensus*, Bos-

ton: Allen and Unwin, 1984.

㉓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London: Mariner Books, 2018.

㉔李巍:《制度之战: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第 2 页。

㉕参见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第 3 章。

㉖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5.

㉗ Kenneth May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fense Contrac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s Lindsay, "Parochialism, Policy and Constituency Constraints: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Strategic Weapons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No. 4, 1990, pp. 936–960; James Clotfelter, "Senate Voting and Constituency Stake in Defense Spending",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2, No. 4, 1970, pp. 979–983.

㉘ Peter Trubowitz, *Politics and Strategy: Partisan Ambition and American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5–150.

㉙ David Mayhew, *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㉚ Edward Chester, *Sectionalism, Politic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Metuchen: Scarecrow Press, 1975, p. 4;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2 ~ 96 页。

㉛ Miroslav Nincic,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㉜ Peter Trubowitz, *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hapter 1.

㉝一战后,英法等国家为国内重建不得不向美国大量借债,因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便由一个外债超过 37 亿美元的债务国迅速变身为账户经常性顺差达 35 亿美元的债权国。此外,欧洲的衰落为美国向此前主要由欧洲资本主导的地区输出资本创造了绝佳机会。仅 1919–1929 年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便由 39 亿美元猛增至 76 亿美元。参见 Cleona 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38, p.447; Frederick Adams, *Economic Diplomacy: The Export–Import Ban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4–193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6, p. 34; Jeffery Frie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2, No. 4, 1988, pp. 59–65.

③④Jeffery Frieden, "Sectoral Conflict and U.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14–1940", pp. 59–65; Wayne Cole, "America First and the South, 1940–1941",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22, No. 2, 1956, pp. 36–47.

⑤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炉边谈话》,张爱民、马飞、孔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⑥Virginus Dabney, "The South Looks Abroad", Foreign Affairs, Vol. 19, No. 5, 1940, p. 176.

⑦Gerald Gamm, The Making of New Deal Democrats: Voting Behavior and Realignment in Boston, 1920–194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⑧Ralph Smuckler, "The Region of Isolation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7, No. 2, 1953, pp. 386–401; Manfred Jonas, Isolationism in America, 1935–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9–21.

⑨Theodore Saloutos and John Hicks, Agricultural Discontent in the Middle West, 1900–193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1, pp. 87–110; Richard White, "It's Your Misfortune and None of My Ow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s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463–495.

⑩Gerald Nash, 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Short History of an Urban Oa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3, pp. 139–159.

⑪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6, No. 2, 1974, pp. 30–38.

⑫Lloyd Rodwin and Hidehiko Sazanami ed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9–59.

⑬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chapter 2.

⑭上述参议员及州长选举数据参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 CNN, <http://www.cnn.com/election/2018/results/>。

⑮Matt Grossmann and David A. Hopkins, Asymmetric Politic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⑯在2016年大选的“铁锈带”各州中,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印第安纳州等全部变成了特朗普和共和党的票仓,只有伊利诺伊州支持民主党。

⑰Colin Dueck, Hard Line: The Republican Part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⑱参见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⑲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⑳Yan Xuetong,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7, Issue. 2, 2014, pp. 153–184.

㉑Aaron Friedberg, "Competing with China", pp. 7–64; Kurt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pp. 60–70; Charles Lane, "We Got China Wrong, Now What?",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8, 2018, Juan Pablo Cardenal et al.,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2018; "Worldwide Threat Briefing: 5 Takeaways, from Russia to China", Wired Staff Security, February 13, 2018, <https://www.wired.com/story/worldwide-threats-briefing-russia-election-china/>.

㉒Collin Dueck, The Obama Doctrine: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㉓Joe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March/April 2020, pp. 64–76.